

## 再考黑城所出 F116: W115 号提调农桑文卷

□刘广瑞

摘要: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对中国藏黑水城文献编号为 M1·0093 [F116: W115] 提调农桑文卷的内容和撰拟时间作进一步考证。认为, 此提调农桑文卷很可能就是元代地方官以《救荒活民类要》为底本, 并参考了《至正条格》撰拟而成, 文书很可能是《救荒活民类要》的某一个地方版。文书撰拟时间上限是元至顺初年(1330年), 下限至北元宣光元年(1371年)。

关键词: 黑水城文献; 提调农桑; 元代; 救荒活民类要; 至正条格

作者简介: 刘广瑞(1982—), 男, 河北沙河人, 邯郸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黑水城文献。

基金项目: 本文为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黑水城汉文文献整理与研究”(11&ZD098)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黑水城文书与元代西北军政研究”(11CZS013)以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黑水城元代汉文军政文书整理与研究”(10YJC770021)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收录一件编号为 M1·0093 [F116: W115] 《提调农桑文卷》<sup>[1]</sup>, 关于此文书的研究, 宁夏大学徐悦曾撰《黑城所出 F116: W115 号提调农桑文书的考释》<sup>[2]</sup>一文, 她首先对文书进行了释读; 其次, 她认为此文书反映了元政府重视种桑养蚕, 并结合史料探讨了元政府在亦集乃路推行区田法和桑粮间作制等方面的问题。这为进一步研究此文书奠定了基础。笔者试在徐文基础之上, 探讨一下此文卷的撰拟时间。为了便于研究说明, 今据图版, 按照吐鲁番文书整理的格式重录并加标点如下。

(前缺)

- 1 [ ] 围一遭计二百步, 打墙一
- 2 [ ] 墙, 打一十二三板, 约人平
- 3 [ ] 墙五堵二十日, 打墙一遭。若
- 4 [ ] 于中心置井一眼, 栽
- 5 [ ] 无害, 今具栽桑区种

- 6  十步，每二步栽地桑一窠
- 7  此栽桑二行，中间留人行
- 8  栽桑一窠一行，合
- 9  栽桑六十窠，更有隔间
- 10  行中间，各留人行道子一步。
- 11  栽桑一窠合栽二十窠，
- 12  桑四十窠，隔间三道，通该
- 13  亩栽地桑二百八十窠。第一
- 14  便得大济，第二年每桑一
- 15  蚕三五箔，第三年每桑一窠
- 16  上，三年外地熟桑大可
- 17  子孙为后业，园墙并眼桑地
- 18  示。
- 19  伊尹教民布种区田，人户不阙，
- 20  天旱不能布种，阙食饥荒，无
- 21  区种法度，劝谕无力贫民，
- 22  一亩之功可敌百亩之收。一园
- 23  具地十亩内，除栽桑人行道
- 24  公作八间，每间该地一亩，横一
- 25  千二百四十步，每步该五
- 26  该分二千六百五十区，内隔
- 27  一区。除内空行隔区外，合种六
- 28  劝农，每区决收一斗，一亩可收
- 29  亩约收五百石。物人学种
- 30  一亩也收二十余石。若种地八
- 31  余石上园内栽桑三百窠，
- 32  上得叶三百余秤，每蚕
- 33  十五秤可老蚕二十余箔，
- 34  使有十口衣食人事。
- 35  不唯种谷。若别辟划

- 36  浇，更有数倍之利。另
- 37  计之。
- 38  度
- 39  箔，每箔约收丝一斤
- 40  两夹桑种蜀黍，每
- 41  尺计空一十尺，每尺
- 42  种蜀黍三千窝，合
- 43
- 44  计收谷二十石
- 45
- 46  不尽
- 47 ☐ 图贴说细搜罗
- 48 ☐ 识平反落韵歌
- 49 ☐ 閻人传不爱钱
- 50 养性栽桑学种田
- 51 ☐ 年大旱种区田
- 52 ☒ 不求天雨济饥年
- 53 ☒ 今日天仙再来传
- 54 ☒ 好心不走自安然

关于文卷的形成时间，由于文卷本身没有纪年，只能推定一个相对的年代。据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以下简称《黑城》）<sup>[3]</sup>记载，“在黑城内发掘所得的汉文文书中，凡属于公文及民间交往的世俗文书，都是元代和北元遗物。在同一坑位地层中往往见有元代或北元纪年。有的文书上虽没有年款，从其格式和文字内容上与有纪年的文书相较，亦可推定其年代。从年款上看到，这一大批文书中，时间最早的书成于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时间最晚的成于北元宣光元年（1371年）”<sup>[4]</sup>。又据同书记载，“我们在黑城考古发掘所得的全部文书，除少量属于西夏时代的佛经外，其余都是元代至北元初期的遗物”<sup>[5]</sup>。笔者曾统计《黑城》一书所收编号为F116的文书是有明确纪年的文书，总数有90件之多，上起至元年间，下至至正年间，纵贯整个元朝。所以，本件文卷为元代至北元初期文书可以无疑。

关于本件文卷的性质，《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编者没有明确说明，但认为有关“提调农桑文卷”的诸件“就是甘肃行中书省据中书省条画，先后下达给亦集乃路总管府的札付。它显然是根据《农桑辑要》陆续下达的指令，要求推行区田法，广种桑树，这也就是所谓的劝农”<sup>[6]</sup>。诚如编者所言，“提调农桑文卷”中的F116:W46文书确实有“农桑辑要”等语，整个“提调农桑文卷”的文书似乎与元代的农书《农桑辑要》有关，但《四库全书》本《农桑辑要》并没有与本件文卷相符的内容，因此，基本可以将本件是

元代农书《农桑辑要》的可能性排除在外。

那么，本件文卷属于什么性质呢？从文卷内容看，它主要是讲栽桑区种，后面还附有一白话诗，显然不是公文。而徐文却把文卷前46行看成是公文正文，并据此从结构上把文卷分为两部分，前46行为第一部分，后8行劝农诗一首为第二部分，显然是不合理的。笔者以为文卷从结构上也应分两部分，1—36行主要写栽桑区种及收获；37—54行主要写桑粮间作及赋诗一首。文卷虽然不是《农桑辑要》，但推测仍然属于农书类。我们知道，有元一代王朝统治的时期尽管短暂，但农书的纂修堪称繁夥，仅《四库全书》收录的元代农书就有《农桑辑要》、《农桑衣食撮要》、《王氏农书》三种，可见元代农书修纂之盛。因此我们推测本件文卷应该与当时盛行的农书编纂有关。

# —

我们看文卷的第一部分。栽桑区种说的是区田法。区田法是西汉成帝时，氾胜之总结的一整套农田丰产技术。其中包括农业耕作园田化的趋向、深耕细作、增肥灌水、等距全苗、合理密植等农田技术，并将其记载在《氾胜之书》中。自汉代在关中地区推行，并取得了比较高的产量。其后，在各个历史时期中，有许多“好农者”进行过大量的区田试验，并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增产效果。且曾出现三次由统治者强令推行区田法的记录。第一次是在东汉明帝时期（约在68—75年之间）；第二次是在金章宗时期（约在1194—1196年）；第三次是在元朝时期，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元世祖至元年间（1264—1295年）。据《元史·食货志》记载，至元七年（1270年），颁布农桑之制14条，其中规定“田无水者凿井，井深不能得水者，听种区田。其有水田者，不必区种。仍以区田之法，散诸农民”<sup>[7]</sup>。第二个时期是泰定帝时期（1324—1328年）。据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编《至正条格》影印本卷二五《田令》记载，泰定二年（1325年）十月，江浙省咨左丞赵资政言区田事理<sup>[8]</sup>。

今照到古人区种法度布粒功勤浇锄一亩之功，可敌□□收。每地十亩，南北长六十步，东西阔四十步，围园□□墙一遭，约人平。园内种植之物头畜不能伤残，于地中心置井一眼，用法汲水溉田并不忧旱涝之灾。

栽桑于墙围四面合栽桑一百株，中心栽桑二行留人行道子一步。南北长六十步，每二步栽桑一株，每一行该栽桑三十株，二行计六十株。东西栽桑二行留人行道子，东西阔四十步，每二步栽桑一株，每一行该栽桑二十株，二行计四十株。十亩地内栽桑二百余株。第一年，打墙栽桑止种区田便得济。第二年，每桑一株可得桑叶三五斤老蚕三五箔。第三年，每一株桑得叶一秤，可老蚕十箔之上。三年之外地熟桑大可十口之上。十亩地内除栽桑人行道子占地二亩外，八亩分作八段，每亩阔一十五步，长一十六步，积算二百四十步。每一尺二寸作一区，该二千六百五十区。除空行隔区外，实合种六百六十二区。古之知法者，每区可收子粒一斗，每亩可收六十石。若止种地八亩，收种谷五百余石。今人学种，一区亦收三五升，八亩地内可收二百余石。若别种芋、栽葱瓜麦麻豆，便有数倍之利。

至如止有一亩地，长一十六步，每步五尺，计八十尺。每行一尺五寸，该五十三行。阔一十五步，计七十五尺。每行一尺五寸，该五十三行。长阔相折通二千六百五十区。空一行，种一行。隔一区，种一区，除隔空外，实种六百六十二区。每区深一尺，用熟粪一升，与区土相和下水三四升布谷十余粒匀，覆土以手按实，令土种相着。苗出，看稀稠存

留，锄不厌烦。旱则浇之。结子时，锄土深壅其根，以防大风摇摆。古人依此布种，每亩亦收二十石。数口之家，便得一年食用。大概似种瓜样法度闲时旋旋掘下种时止是下水下种功夫。正月种春大麦。二月三月种山药、芋子。三月四月五月种谷大小江豆绿豆，八月种二麦、豌豆，节次为之，不可贪多。

种麦区长余深，阔六七寸……

同年十二月，“右丞赵简请行区田法于内地，以宋董煟所编《救荒活民书》颁州县”<sup>[9]</sup>。元明宗至顺初年，桂阳路儒学教授张光大奉命增修宋代董煟的《救荒活民书》，续以当朝救灾恤民之事，并名为《救荒活民类要》（以下简称《救荒》）。其中《区田之法》<sup>[10]</sup>记载如下。

区园地一十亩南北长六十步东西阔四十步，围园一遭计二百步，每墙一堵二步计打一百堵，每六人用墙板一付，打七八板高，务要坚厚，以防漫流雨水之灾。又园里诸树并一切种植之物头口不能伤害。若众人相合其工更疾，谓如地一十亩于中心须要并一眼，用法汲水溉田并不忧旱涝之灾。一栽桑墙围四面计二百步，各离半步，栽桑一株，四面合栽桑一百株，地中心桑二行中间留人行道子一步南北长六十步，每二步栽桑一株一行合栽桑三十株。

二行计栽桑六十株。更有隔间三道，每道东西栽桑二行中心各留人行道一步。其地东西阔四十步，每二步栽桑一株合栽桑二十株，每道栽桑二行合栽桑四十株，隔间三道，栽桑一百二十株。园地一十亩，栽桑二百八十株。第一年，打墙栽桑止种区田便得济。三年内地熟桑大可数口之家，无贫难水涝之灾，更为子孙恒业墙并桑三事不可偏废。

汤有七年之旱，宰相伊尹教民区种，人不缺食，但今人不知此法。每遇旱涝则饥荒缺食，无可奈何。今照到古人区种法度布粒功勤浇锄一亩之功，可敌数十亩之收。每地一十亩栽桑人行道子占地二亩外有八亩分作八段，每亩横一十五步，长一十六步，积算二百四十步，每一尺五寸作一区，该二千六百五十区内除空行隔区外，合种六百六十二区。古者勤农知法者，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桑三百株可老蚕二十余箔，园里栽桑种区田又省人力，免旱涝之忧，并头口伤残之害。不惟种谷，若别槩划种葱栽瓜或麻豆，用水浇灌便得数倍之利。

地一亩，阔一十五步。每步五尺，计七十五。一行占地一尺五寸，该分五十行，长一十，计八十尺。每行一尺五寸，该分五十三行。相折，通一千六百五十区。空一行，种一行。的行内，隔一区，种一区。除隔间外，可种六，十二区。每区深一尺，斟酌用熟粪一升，与，和下水三四升布谷十余粒匀，覆土以一，令土种相。苗出，看稀稠存留，锄不厌烦。旱则结子时，锄土深壅其根，以防大风摇摆。古，此布种，功勤浇锄，每区加数倍，一家五口，一年食用。大概似今时种瓜样法度闲时，掘下种时止是下种水工夫。正月种春，月三月种山药芋子。三月四月五月种谷，红绿豆，八月种一麦豌豆，节次为之，亦不多。

谷豆二麦各料百余区山药芋子各十，收其物足济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如果我们把《至正条格》有关区田记载的前两段、《救荒》有关区田记载的前三段和文卷第一部分1—36行两两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三者虽文字上有差别，但内容上差别不大。

首先，文卷与《至正条格》进行对比，我们可以发现，文卷比《至正条格》记载更加详细，补充了其不足。同时，文卷发展继承了区田法的理论。如《至正条格》只记载“约人平”，而文卷记载了“打一十二三板，约人平”。再如《至正条格》只记载东西只留人行

道子一道，东西栽桑 40 窠。而文卷记载了“隔间三道”，东西栽桑 120 窠。这就发展了区田法的理论，增加了栽桑数量，也就提高了产量，等等。

其次，文卷与《救荒》进行对比。其一，文卷比《救荒》简化精炼，口语化强，文卷整体上看似简化《救荒》撰拟而成，很可能是把《救荒》通俗化了。如文卷省略了一“园”字，等。其二，纠正了《救荒》中明显的错误。《救荒》中“一栽桑墙围四面计二百步，各离半步，栽桑一株，四面合栽桑一百株”。如按“各离半步，栽桑一株”来计算，四面合栽应是 400 株，那么园地“一十”亩，应栽桑 580 株，而不是 280 株。文卷似根据东西三道、南北道“每二步栽桑一株”之法，把“各离半步，栽桑一株”改为“每二步栽地桑一窠”。其三，文卷补充了《救荒》之缺。如《救荒》只记载“第一年”，而文卷还记载了“第二年”和“第三年”。

最后，《至正条格》与《救荒》进行对比可以发现，《救荒》记载更加详细，虽没有记载“第二年”和“第三年”，但同文卷一样，发展丰富了区田法的理论，而且还引用古人之说，进一步说明区田种桑的好处。

这就出现了两种情况：一是文卷很可能以《救荒》为底本，并参考了《至正条格》撰拟而成；二是文卷很可能以《至正条格》为底本，并参考了《救荒》撰拟而成。

《至正条格》是元朝的法律之一。元顺帝至元四年（1338 年）三月，“命中书平章政事阿吉剌监修《至正条格》”<sup>[11]</sup>。至正五年（1345 年）十一月，《至正条格》成。至正六年（1346 年），“颁《至正条格》于天下”<sup>[12]</sup>。元代欧阳玄《圭斋文集》记载《至正条格》包括“制诏百有五十，条格千有七百，断例千五十有九”<sup>[13]</sup>，但原书卷数已不可考究，据《永乐大典》记载，共 23 卷。2003 年，在韩国庆州，发现了世界唯一庆州孙氏家族藏珍本《至正条格》。2007 年，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编辑出版了《至正条格》影印本。从目录上看《至正条格》至少有“断例”29 卷、“条格”34 卷，但实际只存“断例”前 12 卷及第十三卷的部分内容，“条格”第二十三卷至第三十四卷的内容。

《救荒》自元之后其版本流传不详。《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56）》收录的《救荒》是据明刻本的影印本，后《续修四库全书》又据北京图书馆藏明刻本影印收录于其中。如上所述，元代农书修纂之盛，一是数量之多，“元代只有 97 年，但编纂的农书竟达 26 部之多”<sup>[14]</sup>。二是刊行数量多，如《农桑辑要》“在有元一代的前 60 多年中，前后印了八次，总册数超过 1 万”<sup>[15]</sup>。“不少元代地方官对于元政府的农业政策都是采取积极态度的，有的甚至为了贯彻元朝农业政策还翻刻了《农桑辑要》的地方版。”<sup>[16]</sup>如王祯就是这些积极贯彻元政府农业政策的地方官之一，他虽未翻刻《农桑辑要》，但写下了一部《农书》。书中大量摘录《农桑辑要》等前代农书的著述，可见王祯深受元政府的农业政策和《农桑辑要》的影响。另外，《救荒》后经明代朱熊复加补缀成《救荒补遗》，陈龙正又跟着把《救荒活民书》、《救荒》和《救荒补遗》三书订补出《救荒策会》七卷，足见《救荒》流传甚广，受到重视。

因此，笔者推测，《救荒》在元代很可能也很受到重视，且有地方版的刊行，F116:W115 号文卷很可能就是元代地方官以《救荒》为底本，并参考了《至正条格》撰拟而成，文卷很可能是《救荒》的某一个地方版。文卷撰拟时间上限是元至顺初年（1330 年），下限至北元宣光元年（1371 年）。

## 二

我们接着比较文卷后半部分与上文引文《至正条格》第三段、引文《救荒》第四段，我们可以发现文卷后半部分与这两种文献记载都不一样，但两文献记载的内容却几乎一致。笔者检索了电子版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三六册王祯《农书》卷一一《区田》中记载如下。

区田：地一亩，阔一十五步。每步五尺，计七十五尺，每一行占地一尺五寸，该分五十行，长一十六步，计八十尺。每行一尺五寸，该分五十三行。长阔相折，通二千六百五十区。空一行，种一行。于所种行内，隔一区，种一区。除隔、空外，可种六百六十二区。每区深一尺，用熟粪一升，与区土相和，布谷匀，覆土，以手按实。令土种相著。苗出，看稀稠存留，锄不厌烦。旱则浇灌。结子时，锄土深壅其根，以防大风摇摆。古人依此布种，每区收谷一斗，每亩可收六十六石。今人学种可减半计之。又参考《汜胜之书》及《务本新书》，谓汤有七年之旱，伊尹作为区田，教民粪种，负水浇稼，诸山、陵、倾阪及邱、城上，皆可为之，其区当于闲时旋掘下。正月种春大麦。二、三月种山药、芋子。三、四月种粟及大小豆，八月种二麦、豌豆，节次为之，不可贪多。

……诗云：

昔闻伊尹相汤日，救旱有方由圣旨。限将一亩作田规，计区六百六十二。星分棋布满方畴，参错有条相列次。……带山田少阙食多，教不及民深可愧。故将制度写为图，庶使贫农穷地利。会须岁岁保丰穰，共享太平歌既醉。

引文《农书》第一段与引文《至正条格》后两段、引文《救荒》第四段记载内容几乎一致。只是《救荒》缺字较多，上引《农书》中字下加点即是。王祯《农书》始撰于元贞元年（1295年），成书于皇庆二年（1313年），早于《救荒》。这就出现了《救荒》可能参照《农书》而写，《至正条格》可能或参照《救荒》、或参照《农书》、或两者兼有而写。王祯《农书》在永乐年间（1403—1427年）被收入了《永乐大典》。明代在嘉靖九年（1530年）、万历二年（1574年）、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分别进行了重刻。清乾隆时编纂《四库全书》收入本书，称“库本”。《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也收入了本书，这是清代的第一次印本，也是后来流传很广的几种版本之祖本。晚清时，福建、广东、上海也都有翻刻。民国以后，有1924年山东农业专科学校排印本。1937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收入“万有文库”。新中国建立后，有1956年中华书局铅印本，仍用“万有文库本”纸型，稍有修改。1981年，农业出版社出版王毓瑚校订本，以“库本”为主，用“嘉靖本”校补，并参考其他版本，为迄今最好版本。笔者限于资料，只能引用“库本”，并参照了“万有文库本”、199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缪启愉《东鲁王氏农书译注》和电子版“清乾隆武英殿刻本”，四者记载一致。另外，自元以后，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耿荫楼的《国脉民天》、俞汝为的《荒政要览》，清代鄂尔泰的《钦定授时通考》、张履祥的《补农书》等都引用王书的“区田之法”，进一步印证了《救荒》这一部分乃引用王书之可能性。《至正条格》这一部分无论参照哪部文献，都说明元代农书流传甚广。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F116：W115号文卷前一部分转述《救荒》之说，而后一部分并没有接着转述。那么，原因是什么呢？笔者以为，文卷前36行转述《救荒》之说，如第36行以下接着转述就成为二次甚至是三次转述，价值意义就可想而知，因此，文

卷撰拟者并没有接着转述，而是接着写“两夹桑种葛黍”之道，这就丰富了文卷的内容和提高了文卷的价值。且文卷最后赋诗一首，格式与王书相同，说明此文卷可能还参照王祯《农书》而写。总之，F116: W115 号文卷很可能就是元代地方官以《救荒》为底本，并参考了《至正条格》而撰拟而成，文卷很可能是《救荒》的某一个地方版。文卷撰拟时间上限是元至顺初年（1330 年），下限至北元宣光元年（1371 年）。至于文卷的价值，徐文已详细论述，笔者在此不再赘述。

（附：本文在写作的过程中，得到孙继民先生的亲切指导，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 参考文献：

- [1] 塔拉，杜建录，高国祥. 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第一册）[M].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133-140.
- [2] 徐悦. 黑城所出 F116: W115 号提调农桑文书的考释[J]. 宁夏社会科学，2007（4）：97-100.
- [3] [4] [5] [6] 李逸友. 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8、20.
- [7] [9] [11] [12] 宋濂，等. 元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6：2355、622、873、874.
- [8] 韩国学中央研究院. 至正条格[M]. 首尔：韩国学中央研究院影印本，2007：44-46.
- [10] 张光大. 救荒活民类要[M] //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社编辑部.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56）.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642-644.
- [13] 欧阳玄. 圭斋文集[M]. 四部丛刊初编本，集部第411册.
- [14] [15] [16] 鲁奇. 中国古代农业经济思想：元代农书研究[M].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5、59、110.

## Again on the Farming Document No. F116: W115 Excavated from Khara- Khoto

Liu Guangrui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studies, the present paper makes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content and its written time of the farming document No. F116: W115. It is said that the farming document was compiled based on Jiuhuang Huomin Leiyao and by referring to Zhizheng Tiaoge. Its written time is between the first year of Zhishun (1330) of Yuan Dynasty and the first year of Xuanguang (1371) of Northern Yuan Dynasty.

**Keywords:** Khara- Khoto; farming documents; Yuan Dynasty; Jiuhuang Huomin Leiyao; Zhizheng Tiaoge

（责任编辑 魏淑霞）